

DOI: 10.12046/j.issn.1000-5285.2018.02.016

· 传播学理论与实践 ·

皮尔斯 “真知目的论” 与维纳 “反馈目的论”

赵毅衡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目的论是一种用“达到某种目的”来解释人类活动意义的方式, 目的直接影响到价值。“非目的论”主要有两种, 一是“偶然论”; 二是过程的因果论, 认为任何意义的发生都是先有原因引出的过程, 无须目的。它们是两种不同时间向度的展开: 我们把现状当作“果”去追溯过去, 找到成为现状之因; 我们看到现状, 而根据目的预判选择的价值。中西古哲人有清晰的目的观, 而现代思想首先就着力于消除目的论, 因果观成为机械论与进化论的基础。但是现代性成熟后, 目的论重新兴起: 维纳的控制论的“反馈即目的”思想, 对20世纪下半期影响极大。本文详细讨论了一个多世纪前皮尔斯提出的“真知目的论”, 指出其理想主义价值观, 与维纳式的内在目的论不同, 二者可以互补。

关键词: 目的论; 因果论; 控制论; 反馈; 真知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2018)02-0145-09

本文讨论意义的未来性目的, 这个问题对人生的价值至关重要。如果有人把“目的论”解释为“因果论”, 只有一个办法: 预知未来, 从未来之果回顾此刻之因。只有这样, 他才能把意义活动的此刻变成因, 把未来变成果, 今日之因才能够决定未来之果。但是这样就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逻辑与道义障碍。

姜峰楠小说《你一生的故事》(*The Story of Your Life*), 以及据此改编的电影《降临》(*Arrival*), 就出现了这个道德难题: 女主人公根据外星人传授的“非线性无时态语言”知道了未来: 她的女儿将会攀岩失足而跌死(在电影中为减缓死亡的惨烈, 改成患白血病), 但是她依然结婚生女, 甚至与女儿一起去攀岩, 而且目睹女儿惨死。这是不是对女儿的命运不负责任? 是不是对未来不负责任? 姜峰楠小说对此提出的辩解是“从一开始我就知道结局, 我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 就是未来之路。”^① 女主人公放弃目的性, 实际上女主人公放弃的是“选择”这个最重要的意义活动。

知道今日之因, 将成就明日必然之果, 就剥夺了选择权: 好事不做也会发生, 灾难明知会发生却无法阻挡, 目的论就此进入自毁模式, 变成宿命论。任何目的, 只有落在尚无法实例化的未来, 只有

收稿日期: 2017-10-24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赵毅衡, 男,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 符号学、叙述学、意义理论。

^① Ted Chiang, *Stories of Your Life and Others*, New York: Tor Books, 2002, p. 187.

作为一种可能性,才能影响我们的意义活动。对预知的未来放弃选择,未来就不再是未来,目的也就成为因果。在人类的意义活动中,为什么目的论如此重要?本文试图做一个回顾讨论。因为篇幅有限,不可避免会有些简单化。

一、何为目的论?

目的论是一种用“达到某种目的”来解释事物运动和人类活动的方式。目的论范围很大,粗略说可以有几类分法:宏观目的论,试图解释世界全部现象,包括世界万物的运动与演变,或是人的全部实践活动与精神活动;有限目的论,解释某一类或某一局部范围内的现象。外在目的论,用外在目的因作为事物变化的动力;内在目的论,用事物或系统内部的某种目的性机制解释事物或系统的活动。价值的目的论,认为某种价值的追求是变化动力;理性的目的论,认为用某种人的理性可以理解的方式是变化的规律。

笔者提出的这个分类方式似乎琐碎,但本文下面的讨论证明,这种基本分类是有必要的。应当承认,目的论的“宏观”与“有限”,“外在”与“内在”,“价值”与“理性”,它们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明确。有时候它们会互相转化,甚至有时会被统合成为合一的目的论世界观或宇宙观。在本文对各种目的论的讨论中,有时不作细分,甚至可能无法细分,但是可以说:以上的这些分野,对本文的讨论不至于落入纠缠,至关重要。

另一个会引起争议的问题是:究竟目的是什么?道德的“善”、认知的“真”、系统的“平衡”、选径的“最高效”,具形的“最完美”等,这些目的可以说完全不同。但是作为运动与变化的最基本动力机制,这类系统有根本性的相同点:它们的变化动力不是突发偶然的,也不是纯因果的,而是目的论的。变易过程遵循的秩序和规律,符合某种目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目的,都会让我们的行为产生一种选择的或价值的理性。

应当明确声明的是:本文并不是关于目的论(teleology)的哲学史讨论,不可能对这个问题的哲学文献,以及各种理论卷入长期的争辩,做一个细致清晰的梳理。本文只是想回顾传播学与符号学的某些观点,用以讨论人类的意义活动是如何进行的,本文想说明符号意义活动为什么必然以目的论为基本规律。最后还要进一步说明,为什么符号学的基础是一种“真知目的论”。为此,本文会简略地回顾一下中西贤哲的一些目的论讨论: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理论,儒家的“至善”道德目的论,到中世纪的“神学目的论”。本文也会提到在早期现代的思想界,为什么目的论被全面压制,而最后在当代为什么目的论会辉煌地复兴。

在这个背景上,本文会回顾并重新评价皮尔斯对目的论的巨大贡献。本文会论证符号学的“真知目的论”作为一种外在的、宏观的、理性与价值兼顾的目的论。这对于我们理解人的意识,理解意义活动的本质,理解人的存在,是个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在目的论的反面,简单地说,主要有两种对万物变化的“非目的论”解释。一种是“偶然论”(fortuitism),这种看法认为世界的变化充满偶然,无法解释,亦无规律可循,当然也就没有目的。例如认为我们来到世上纯属偶然,我们平生许多事情“命运使然”,充满荒诞,至今,关于社会中个体的遭遇,偶然性依然是无法从哲学上解释的难题。最为众所周知的偶然论人生观,或许是曾风靡一时的萨特的“存在荒谬论”。最常见的偶然事件,或许是艺术家的灵感,对灵感我们至今无法给予充分的解释。艺术创作冲动中强烈的反定义反规律倾向,^①正是其偶然论本质的表现。

^① 陆正兰、赵毅衡《艺术不是什么:从符号学定义艺术》,《艺术百家》2009年12期。

另一种反目的论的理论，是过程的因果论（causationism）。此说认为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是先有原因引出的过程，而一旦此事无发生，必然会有后果的，因此世界万事都是因果链上的一环。佛教的因果报应论是最明显而且覆盖一切的因果论，《金刚经》说“有为法”（运动变化规律）：“一切有为法，尽是因缘和合，缘起时起，缘尽还无，不外如是。”在现代思想史上，因果论得到的最有力的支持，是牛顿的力学体系，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机械论”哲学：认为目的是没有的，因果却永远存在。另一个强大的因果过程论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新的生存条件就是变化和运动的原因，变化的动力就是为了适应此原因，“适者生存”并非目的，因为地球自然环境变化没有目的。因果论引发了现代思想史上一系列的重要争论：例如赫胥黎与斯宾塞关于“人化世界”是否遵循进化论的争论；弗洛伊德与荣格关于人性是否由“性力”预定的争论。

应当说明的是：因果论很容易与目的论混淆。奥地利哲学家米塞斯承认“因果性是目的论的前提”，没有因果关系，目的也无法取得。但是他强调指出“目的论也可看作是因果关系的一种，这固然不错，但是这种说法并不是取消这两个基本模式之间的本质上的差异。”^①实际上，这两种互相依靠、看起来似乎是一致的理论，实际上方向正好相反。

可以总结出目的论与因果论的两点不同：因果论是一种工具论，以“有效”为标准，而目的论是必然论的，不取决于效果。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两种不同时间向度的展开：我们把现状当作“果”去追溯过去，找到成为现状之因；我们看到现状，而根据其运动变化目的预判其未来可能，这是非常不同的两种认知世界的方式。因果论寻找变化过程。从过去至现在的内在机制，而目的论思考变化的未来趋近的终结（finality）状态，它们着眼于两个不同的时间向度。因此，“非决定论承认有一个过去，但是有许多同等可能的未来：实践就是一座分岔小径的花园”。^②

目的论思想，不同于偶然论或因果论，用某种目的性解释世界的变化和人的活动，实际上为人类行为提供了一个可以争取的目的，让我们能在此刻面对未来有目的地进行选择。因此，各种目的论之间的区别，可能相当大。本文的重点是讨论皮尔斯的目的论与其他目的论的区分。

二、目的论的兴衰史

虽然“目的论”这个术语，要到17世纪才由德国启蒙时代哲学大师克里斯提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提出，^③目的论思想在中西古代思想中很早就有萌芽，应当说是人试图理解世界万物的本能追求。《大学》开篇之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就是对世界目的论式的认识，对“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的致知目的。而人的这种认知活动有个道德目的，即“止于至善”，自己达到至善，让“民”也“新”，而共同达到至善。

这是儒家“道德目的论”的贯穿性总纲。《论语》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可以说是儒家体系的目的论结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力求做“君子”的道德有若干要求“知命”的人生目的“知礼”的社会目的；而“知言”则是君子成就至善的方法保证。符号表意和认知，是达到道德目的保障。

儒家思想道德目的论的另一个表现，是孔子的“正名”论。《论语·子路》：“名不正，则言不

^① Ludwig von 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66, vol. 1, p. 56.

^② J·P·伯吉斯《逻辑与时间》//R·B·马库斯等著《可能世界的逻辑》，康宏逵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174页。

^③ Richards, Robert J. “Christian Wolff’s Prolegomena to Empirical and Rational Psychology: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124, No. 3 (30 Jun. 1980), pp. 227 - 239.

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符号表意恰当,表现顺畅的目的,不仅是君子自己的修养,目的是社会治理,这是儒家在符号认知问题上所坚持的理性道德目的论,曾经得到目的论的提出者沃尔夫的高度崇仰,本文在结束段也会有所回顾。

在西方,目的论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阿那克萨戈拉。他曾说“一切将要存在的、一切过去存在但现在已不复存在的,以及一切现在存在而且将来也要存在的东西,都为理智所安排。”^①这是希腊哲学的理性目的论:万物运动是由自主的理智有目的地安排的。柏拉图的外在目的论相当宏观,他认为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现象世界”只是追慕理念世界,才得以秩序井然。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论”明确提出了“目的因”,世间万事发生和形成有其合目的性,这可以说是一种内在的目的论“在那些产生出来而且由自然产生出来的东西里面,是有那种有目的的活动存在。”^②

欧洲中世纪的哲学家则从古希腊的目的论思想出发,建构起庞大的神学目的论体系。上帝是超越于人和宇宙万物而存在的,一切变化都是上帝所安排。人的命运,是神为了奖励世人,或为了惩罚这世界而制造的。在中世纪漫长的岁月中,神学主张上帝意志是全面而宏大的外在目的论,它完整地覆盖了价值论、神学目的论,保证了人的思想合一。

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延续十多个世纪的神学目的论的桎梏,现代思想的起始,首先就着力于消除目的论。理性主义哲学,伽利略和牛顿的机械物理学,达尔文进化论,以及现代思想的各种分支,使过程因果论成为解释一切规律的思想。

科学理性主义的最早创导者培根,也是最早对目的论进行猛烈攻击的人。他指出:“(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除涉及人类活动的科学外,只有败坏科学而不会对科学有所推进。”他断言“探索终极因,就像奉献给上帝的修女是不会怀孕生育的。”^③伽利略也认为,科学研究回答“怎么样?”,而不是“为什么?”笛卡尔则坚持认为,终极因是不存在的,必须从思想中清除一切目的论语言。^④

在霍布斯和笛卡儿的思想中,过程的因果成为指导人类思维的最有效哲学,而法国机械唯物主义把它推进到极端。机械论主张将事物还原为具有一定形状、体积和速度的物质,不仅按照机械力学的原理来解释自然万物,而且用这种因果论来解释人和社会,或许机械因果论最外在的表现,就是19世纪后半期孔德的实证主义,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这种观点,整个宇宙都成为一个具有精致构造的巨大因果设置。

一旦完全颠覆了目的论,精神世界的根基也一道被颠覆,而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的目的性,可以被悬置,置之度外。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都只有因果,那么一切都可以靠理性来追根寻底,凭借理性就可以彻底认识世界,价值问题暂时可以搁在一边。伴随着机械论发展的是理性的高扬,人的主体性地位得到确立,因为人是唯一具有主体性和理性的存在。

但是,如果自然界只是一部巨大的有因果的机器,人的精神价值反而出现了危机:理性洞察一切的监管,剥夺了意识主动性的地位。一旦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不复具有根本的目的性,人的追求和道德感也就不再拥有用目的才能辩护的价值。在现代科学革命和科学主义盛行的年代,人的意识与精神几乎无存身之地。机械因果论完全取代目的论,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哲理玄谈,而是对世界的基本态度问题。反目的论的后果相当严重,它带来了功利主义的泛滥,无目的的眼前利益

① 苗力田《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6页。

② 北京大学哲学系《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251页。

③ 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6页。

④ Karen Detlefsen, “Teleology and Nature in Descartes’ Six Meditations”, *Descartes’ Meditations: A Critical Guide*, Cambridge Univ. Press, p. 153.

价值,造成人类对自然的漠视和过分掠夺,“改造自然”最终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愈演愈烈。

三、维纳的控制目的论

正是在这个背景上,在后期现代思想的发展中,目的论思想又涌动起来。^①目的论思想的复活,体现出现代性成熟后,人类的观念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目的论的回归,开始只是哲学讨论,后来才出现了各种实际操作方案。

康德首先阐明了目的论转向的必要,在其名著《判断力批判》中,他明确表示要维护目的论的应有地位,不然信仰和道德将不复存在。他恢复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内在目的论,在目的论领域中注入了价值理性。康德认为真正的内在目的只是生命有机体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有组织的与自组织的”特性。^②内在目的只是人类用来评判自然的一种方式,不是一个“构成性”的概念,而是一个“调节性”的理念。^③因此,康德的目的论基本上是内在的,他尚未为外在目的论辩护。但是他的思想是当代目的论复兴的先驱。20世纪出现了有机哲学、系统论、环境科学和生态伦理学等,或多或少都能看到康德式内在目的论思想的影响。有机哲学的代表人物是提出“过程主义”的怀特海,他反对将事物变化看作是机械运动,他认为应当把事物看作是有目标的系统有机体。这个主体目标,一般说来就是“自为事物”的“自我保持、持续、重现等”。^④被趋向的状态的实现,就是系统的目标。这样达到系统目的的过程,便具有了独立于主观的工具价值。康德、怀特海设立的内在目的论框架,为当代意义理论与传播的目的论分析奠定了基础。

对当代目的论造成最大冲击的,是20世纪40年代维纳提出的控制论。控制论认为反馈机制使系统保持运作,取得反馈并籍以调节控制系统的运作,就可以保证系统运作的目的。控制论通过一个系统过去行为的效果信息,来自我修正,目的是控制这个系统的未来行为取得最好效果目的。此系统不一定需要运作的目标,也就没有必要的外部目的。用维纳的名言来说就是“一切带有负反馈的调节机制,都有内在目的。”^④维纳的控制论实际上是一种“有限内在目的论”,并用此解释各种问题的观点。

一旦仔细考虑,就可以看到,这种反馈达成目的的理论,大致相当于处理一种往返回复的因果关系,考虑系统如何达到平衡。这种“反馈调节即目的”的观点,实际上离因果论并不远,因此甚至在机械力学中一样可以找到反馈目的论。例如,物体靠惯性维持自身的运动状态,一旦作用遇到反作用,就出现一个作用一反作用的回馈系统,速度就慢下来甚至停止。甚至瓦特的蒸汽机也有速度反馈调节,过分的蒸汽会经过反馈自动排出,使压力降低。如此讨论,连牛顿力学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可以说具有目的性。同样的解释方式,可以让电磁学的楞次定律,化学的勒夏特列定律,都成为反作用形成的目的论。而在费尔马的光线折射定律,在费曼关于粒子选取路径的量子力学定律中,我们能看出更复杂的反馈目的论。同样,在因果论占主导的生物学中,也出现了迈尔的“生物程序目的论”,此论认为生物体的变化,是“由于某种程序的运作而目标定向的”^⑤。

康德对这种往返因果性达成的目的性,早有所洞察,他对“合目的性”概念的规定是“一个概念的因果性,就它的对象来看就是合目的性。”^⑥通过效果来判定对象的因果联系,就是在思考着其目

① 李建会《重返亚里士多德:目的论解释在当代生物学中的复兴》,《潜科学》1994年第5期。

②③⑥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3、225、66页。

③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01-102页。

④ 维纳、罗森勃吕特、别格罗《行为、目的和目的论》//《控制论哲学问题译文集》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4页。

⑤ E. 迈尔《生物与哲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6页。

的,从系统反馈而延续变化来考虑因果,就引向了内在目的论。进入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理论。这是一个学科群的总称,对象从宏观到微观运动,涉及科学的各个领域。但它们讨论的核心就是变化规律问题,把所有这些系统的目的,总称为“吸引子”(attractor)。用数学模式看,它可以是一个点,或一个极限环或环面。任何系统,简单的(如重力)或混沌的(如热力耗散体系),其演化趋向于一个终极状态作为系统的收敛方式,因为体系演化总是存在着一个力求均匀稳定,这种吸引子就是系统演化的目的。对此,钱学森有过精辟的概括。他说“所谓目的,就是在稳定的环境中,系统只有在目的点或目的环上才是稳定的,离开了就不稳定,系统自己要拖到点或环上才能罢休。这也就是系统的自组织。”他又指出“如果系统自己要走向一种有序结构,那就是说代表那种系统有序结构的点的系统是目标,不管从空间的哪一点开始,终归要走到这个代表有序结构的点。”^①目的的作用就是规定系统最终要演化到吸引子上来。目的性,就是“寻的性”,就是系统追寻有序性的“物理标的”。自组织理论,比控制论复杂得多,影响更为广阔,但依然是单系统内部调节的目的论。

控制论很快对道以奇和施拉姆等创立的当代传播研究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一个传播系统中,反馈是接受者对于传播者信息的回应,这就是信息的效果。反馈形成了一个信息回路,它需要从接受者传回到传播者那里另一个信息,这个往复信息的过程,也就是控制目的论指出的基本机制。施拉姆一再承认,控制论是传播学的立足之地。^②至今传播学的主要工作,是在反馈—调节中寻找影响受众的最有效途径。

笔者并不否认维纳式的因果—目的循环论是一种目的论,只不过它是一种内在的(系统内部的)有限的(除了系统本身运作之外无超越价值的)目的论。就人类意识定义自身的意义活动而言,恐怕我们需要一种外在于此系统的、有超越性的目的论。维纳1948年提出控制论的开篇,标题就是《控制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在此文中他明言反对将控制论延伸到社会问题。在后期,他开始认为人的意识更需要通过互动与反馈来了解自我,因为社会问题必然牵涉到人的意识与意志,而人的精神,需要远远超出“反馈控制”的系统内运行目的。但是他的“系统内在控制”目的论态度未变。

四、符号学的真知目的论

本文此部分想要详细讨论的,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目的论,即皮尔斯的符号学“真知目的论”,比维纳早了几乎有一个世纪。只是因为皮尔斯遗留的大量笔记过于杂乱,到近年才有系统的整理和翻译出版,^③至今国人没有仔细讨论过皮尔斯符号学的目的论思想。很多人认为符号学只是一种方法论,只是为了解释意义活动如何运作,并不是为了给自然运动与人世变易一个统一的解释。学界不少人认为,符号学有强大的操作性,却不能讨论本体论或目的论这样超越性的哲学课题,但是创始人之一皮尔斯为符号学作基础性考虑时,出发的问题远超出方法论的范围。他提出的是一种远远超出“内在反馈目的论”的外在宏观目的论。

符号学试图解释意义,即意识与世界的联系,是如何产生的,而且如何取得三种效果:第一,意义活动如何藉与事物的互动构成意识;第二,在个人意识中意义活动如何积累成经验;第三,在社群意识中意义活动如何沉积为文化。意义活动能达到这三种目的,根本的原因是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承

① 《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钱学森等《论系统工程》,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第245页。

② 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传播学概论》,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6页。

③ 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编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载: 所有的符号都是用来承载意义的, 没有任何意义可以不用符号发出或解释, 符号学就是意义学。^①

皮尔斯于1865年, 也即他26岁时, 写了一篇文章《目的论逻辑》(Teleological Logic)^② 这是他一生很少发表的论文之一。他把“逻辑学”定义为“客观符号学”, 并把符号学这门新学问的研究范围限定在“再现与其对象之关系”^③。此文是皮尔斯从逻辑学角度建立符号学学科(他当时称作symbolistic)的起始之作。^④ 皮尔斯在学术生涯刚开始, 即他的符号学体系尚未形成时, 就已经坚持以“目的论”作为符号学的学术宗旨, 而且大书在标题上。他一生坚持强调目的论对符号学的贯穿性意义, 本文无法对此做全面分析, 仅仅从皮尔斯符号学的三个方面, 讨论符号学的这种“真知目的性”。

首先, 是皮尔斯极力推崇的“试推法”(abduction), 他称之为在演绎法与归纳法之外的第三种逻辑方式, 这是皮尔斯思想中特别接近一个世纪后维纳“控制目的论”的地方。“试推”就是“试错”, 给出一个假设, 看是否效果正确, 设法追查原因, 并再给一个解释。皮尔斯认为试推与归纳、演绎不同, 是一种“双向”思考的方式。^⑤ 他认为任何符号交流无法摆脱试推, 因为这是一种依靠效果的“逆推法”。一种后验性(也就是根据反馈)的归纳法, 显然, 这种反馈纠错的“试推法”逻辑, 只适用于系统内部的有限目的论。

第二, 是符号意义的“未来性”, 与目的论的未来时向非常一致。^⑥ 可以看到, 这是目的论区别于非目的论的一个明确指标: 因果论是过去时的, 认知由果推因, 是回溯过去; 偶然论则是现在时的, 因为一切以机缘巧合以此刻为转移; 而目的论则是未来时的, 落在有待创造的未决状态中。许多关于事物变化规律的论辩, 说得非常复杂, 而“先在原因”与“后在目的”, 是检查因果论与目的论相当明确的准则。

皮尔斯对解释项的未来性很着迷, 他为符号的“无限衍义”提出一个奇妙的解说“人指向此刻他注意力所在的对象; 人却意味着他对此对象的知识 and 感觉, 他本人正是这种形式或知识类别的肉体化身; 他的解释项即此认知的未来记忆, 他本人的未来, 他对之表达意义的另一个人, 或是他写下的句子, 或是他生下的孩子。”^⑦ 在这短短几行里, 皮尔斯列举了一连串的“未来”。他关于人作为符号的一系列“解释项”都类似他的“孩子”, 这说法非常幽默, 但是其未来性也不可能更加明确了: 此刻的意义活动, 产生我的写作, 我对他人的意义传达, 我的孩子, 都是我本人作为符号存在向未来目的的延伸。

因此, 符号意义的目的性必须是一个未来的“待在”(Becoming), 一种供选择追求的可能性, 不然会造成完全无法处理的道德困境。而符号学认知的意义, 是未来性的, 也就是一种可能, 而不是一种必然, 所以意义值得去努力解释出来。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是皮尔斯一再强调的符号意义活动, 以“真知”为目的。皮尔斯的目的论远不止于表意—解释系统内在目的性, 他一生都坚持认为符号活动的目的, 是“真知”(truth), 符号学作为意义之学, 应当以取得真知为目的。试推之所以是必要的, 是因为意义活动以

① 赵毅衡《重新定义符号与符号学》,《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6期。

② *The Writings of Charles S Peirce: A Chronological Edi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1967-1999, vol. 1, p. 303.

③ *The Writings of Charles S Peirce: A Chronological Edi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1976-1999, vol. 1, p. 304.

④ 张留华《皮尔斯为何要把逻辑学拓展为符号学》,《符号与传媒》2015年第10期。

⑤ 赵星植《论皮尔斯符号学中的“信息”概念》,《符号与传媒》2016年第13期。

⑥ 朱林《仪式的时向问题: 一个符号叙述学研究》,《符号与传媒》2015年第10期。

⑦ Charles Sander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31-1958, vol 7, p 591.

真知为目标,因为“人类心灵与真相亲近”。^①他认为真知也应当是传播的目的“这与那种考察意义通过符号从心灵到心灵、从一个心灵状态到另一个心灵状态进行转化的研究相一致。”^②皮尔斯认为符号学的目的,不仅是“认知”,而且是对“真理”或“真相”的认知,我们可以称之为“真知”。

在皮尔斯的理论中,任何符号的意义总是需要另一个符号才能解释,而那个符号又需要解释,循此绵延直至无穷,这就是所谓的符号“无限衍义”。皮尔斯指出,符号活动关注的是“目的所指的最终解释项,以及探究符号为了使其与目的的相关所必须遵循的条件”^③。在皮尔斯看来,真知既是意义活动的最终目的,更是每一步意义推演的本质动力“符号的目的——即思想的目的——就是把真知带入到表达之中。”^④

正是在这里,符号学与目的论相遇。皮尔斯说,“目的正好就是一个符号的解释项”,人类大脑就具有使符号与对象之间产生非偶然的或非因果的联系的能力。如果符号活动以真知为预设目的,就是指定符号的无限衍义最终会归结到真知,一切意义活动都与目的相关,这个目的就是“真”,这是符号活动的最高原则。

如何将有限的符号追求解释的活动,联系到这个目的上呢?皮尔斯将这一观点进一步表述为:“符号的目的就在于……把自己与其他符号相连接,竭尽所能,使得解释项能够接近完全的真知,或绝对的真知,也即接近真相的每一个领域……‘真知’实际上不是抽象的而是完整的,它是每个符号的最终解释项。”^⑤符号意义探究应当具有企及真知的可能性,哪怕这个真知只作为一个最终不可能完全企及的,意义活动会无限逼近却永远达不到的所谓的“终极解释项”,才是符号学的目的。

而且皮尔斯认为,真知永远留在未来,因为它不是个人意识的需要,而是“众人”的社会文化意义活动需要的东西,这众人可以是全体人类,可以是部分人,尤其是关心这个问题的社群,例如科学家社群。社群可以有大有小,有短期有长期,并不是永恒不变、永远延续的社群,才能走向真知:“真知,这可能意味着对关于现有问题探询存在着一个注定的结果。”^⑥真知是一种抽象的一致性,是一种无穷进展背后的理想极限。

正由于此种“意义本质上的未来性”,符号意义的目的性就与宿命论完全不同,此刻的意识不可能知道尚未能实现的意义。在此我们可以回到本文开始时提出的姜峰楠小说《你一生的故事》与电影《降临》的道德难题:哪怕知道未来的灾难,我们依然不能做任何改变吗?首先,意义是未来性的,所以意义不可能让我们确切地知道,任何符号行为是片面的,任何意义只是一种可能性的估量;第二,任何阶段的解释,只是符号文本触发的无限衍义中的一环,人类意识无法知道意义演化的终极环节。哪怕是外星人的“非线性”语言符号,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时间之所以为时间的关键品质。近年来物理学界关于多维世界的讨论,还没有解决触及多维世界叠合才可能出现的问题,至少这已经不是一个符号意义理论能处理的问题。

为什么呢?因为个人的生命有限,不可能企及未来“死亡使我们的风险数量及其推断数量变得有限起来,……逻辑性无情地要求我们的兴趣不应当有所限制;它们不可以在我们的命运面前停步,它们必须拥抱整个社群。”正因为意义不可能在任何此刻实例化,达到最终的一致同意的意义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不但永无获得真理的可能,而且可能根本没有真理。这样,真知就只是一个无法

① Charles Sander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31-1958, vol. 5, p. 172.

② Charles Sander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31-1958, vol. 1, p. 444.

③ 李斯卡《皮尔斯符号学导论》//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编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5页。

④ Charles Sander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31-1958, vol. 2, p. 44.

⑤ *Annotated Catalogue of the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76, p. 517.

⑥ Charles Sander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31-1958, vol. 3, p. 432.

证实的“理想的极限”而已。社群真知的最大作用，是让个人和社群的意义活动朝真知的未来方向行进，永远的未来才是真知的最终形态，真知只是一个朝着目标演化的“真知过程”。皮尔斯的真知观，听起来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颂歌。

由以上说的三点，我们可以看到，皮尔斯的意义目的论，与维纳的控制论不同。他明确以“外在的”真知为目的，而不是维纳那样以系统内自我组织为目的。而哲学符号学必须从意识的意向性为出发点。在目的论意义上，符号学越出了方法论的桎梏，进而探索人的意识之哲理性构成。^①

应当说清楚：今日的传播学并不完全以反馈为目的，也很注重讨论“真相”问题，但是无论是“细节真相”，还是“宏观真相”，还是超越细节的“本质真实”，都是作为传播信息的出发点存在，作为对信息内容的要求存在，而不是作为传播的目的论存在。也就是说，“真相”是传播过程的原因推动力，而不是期盼中的、只有在未来才能实现的可能性。这样的话，“真”就是推动过程的因果，而并非着眼于未来的目的论。作为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性意义活动，传播依然必须以真知为运动目的，此时或许听一下皮尔斯的“社群真知”目的论，会有一些参考意义。

可以看到，符号学的“社群真知”目的论，与本文开始时说的儒家的社群性道德目的论有相似之处。符号哲学的认知目的论，是内外两种目的论之结合，它推动个人意识与社群意义世界形成共同目的。这是皮尔斯式符号学与其他符号学者倾向于方法论符号学的最不同的地方，也是与倾向于内在有限目的论的哲学家不同的地方。符号学的目的论，是一种外在式的，而且是宏观超越性的目的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各种派别，可能会反对各种外在目的论明显的“宏大叙事”色彩，但是皮尔斯的目的论，是一种在现代哲学中很少见的理想主义理论，是我们当今的意义理论研究应当继承的宝贵遗产。

(责任编辑：林春香)

(上接第136页)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就无从谈起，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也将失去基础。如果国民与国家之间仅仅是一种契约关系，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没有基本的认同，将是易于解体而不稳定的。

其三，相对于“政治中国”“经济中国”或“意识形态中国”而言，“文化中国”超越而包容三者，可以弥合海峡两岸不同政治实体及其不同意识形态所构成的分裂局面。在海峡两岸，特定的历史时空，造成了两岸人民在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的落差。就文化认同而言，两岸民众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字、历史传统和信仰体系，这正是“中国”的文化根基。就政治认同而言，马关条约之后，台湾先后经历了日本的殖民统治、国民党政府的威权体制。特别是1949年以后两岸在治权上的实质分离，导致两岸人民在政治认同上有着极大的隔膜。现代性的政治认同固然重要，但以文化认同作为其根基，相较于政治民族，文化民族更具稳定性与凝聚力；虽然国家正当性的来源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此海峡两岸民众一致的文化认同，有助于弥合由特定历史时空造成的政治认同的分裂。李扁时期推行的“去中国化”教育，正是想通过歪曲历史，隔断两岸民众在文化上的联系，塑造所谓的“台湾认同”。

(责任编辑：丁翔)

^① 赵毅衡《意义理论、符号现象学、哲学符号学》，《符号与传媒》2017年第15辑，第34页。